

# 雨中湧泉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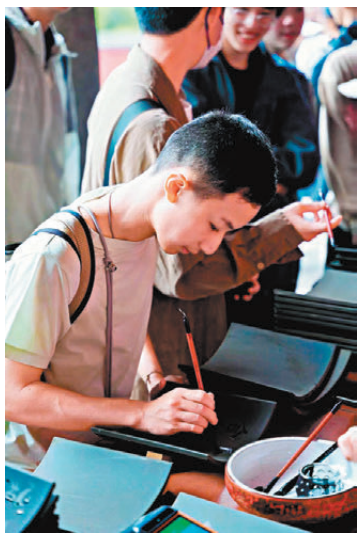
生態關懷 童心

5月的雨，不疾不徐地落在千佛陶塔的風鐸上，發出清脆的妙音，像是在敲醒福州鼓山葳蕤的草木，以及掩映其中的千年古刹。我走進湧泉寺，頓覺清爽。大雄寶殿前，沒有熙熙攘攘的香客，而是在一張長條桌上，安靜地擺放着大小不一的瓦片，還有毛筆、墨汁——那青色的瓦片旁邊，有一張淡雅的黃色紙箋，上書「惜福供養」4個字，下面的一段佛語，講解了磚瓦象徵建築的基礎與穩定，在佛教中有「為寺院添磚加瓦」的惜福供養之意。同行的學生問：「寫一片瓦要給多少錢？」值班的僧人答道：「隨喜功德。」14歲的學生仍不放心，用眼神詢問旁邊的人，到底應該給多少錢？有人朗聲道：「三塊也可，五文亦可，不給也無妨。」學生歡歡喜喜地寫了「闔家平安」，又打開微信掃了5塊錢人民幣。我笑吟吟地看眼裏，什麼也沒說，什麼也無須說。

湧泉寺的大氣並不僅顯於外在，那藝術水平極佳的佛像、雕塑、陶塔，栩栩如生，又絕不張揚。而它的大氣，更體現在所有的「鎮寺之寶」都毫無保留地供遊客自由參觀——相比於不少寺院設置的各種「限制」，湧泉寺的「三寶」甚至可以讓遊客近距離地觀賞、研究，實在難得。

湧泉寺保存有明、清佛經雕版一萬多塊，刻工精美，被譽為「皮藏佛典古版之寶窟」，是湧泉寺「三寶」之一。而清代高僧刺血書寫的佛經，書寫時需長期不食鹽以防血液凝固，並調以金粉或硃砂，色澤鮮紅或暗紅，這「血經」使得湧泉寺在東南亞赫赫有名。

湧泉寺的名人題句甚多，靈源洞至聽水齋沿途，布滿宋元明清題詠300多處，會集篆、隸、草等書法精華。在雨中，「行仁義事」紅得格外鮮亮。



●英華書院學生在青瓦上揮毫寫下來自香港的祝福。 作者供圖

# 到香港去「饅須有」吃肉夾饅

大地遊走 良心

昨天上午，西安著名的肉夾饅在香港跑馬地景光街12號正式亮相。

西安肉夾饅的歷史，最早能追溯到戰國時期的「寒肉」，發展至今已集秦漢技藝與民間智慧於一身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它的歷史淵源和故事非常豐富：肉夾饅裏的臘汁肉，歷史比饅更悠久。最早源於戰國時期的韓國（今晉豫交界處），當時叫「寒肉」。秦滅韓後，製作工藝傳入長安（今西安），在西安生根發芽。古籍記載：這種做法在《周禮》的「周代八珍」和北魏《齊民要術》中均有類似記載，可見其傳承之久。

饅也十分的講究：正宗的西安肉夾饅用的是「白吉饅」，講究外皮酥脆、內裏綿軟，必須有「鐵圈虎背菊花心」的紋理。相傳八國聯軍侵華時，慈禧太后逃難到西安。一晚，她的御廚外出覓食，被一家樊姓店舖的肉香吸引。為感謝老闆，御廚傳授了一套宮廷

「北派打餅」技法，從而誕生了「白吉饅」。

「肉夾饅」為什麼不叫「饅夾肉」呢？明明是「饅夾肉」，為什麼叫「肉夾饅」？個中奧妙主要有兩種說法：一說是古漢語習慣，源自「肉夾於饅」，省略了「於」字，更符合古漢語表達習慣。二說是當地方言，西安話裏「沒」（mo）與「饅」（mo）同音。若叫「饅夾肉」，聽起來就像「沒夾肉」。小販為了強調「真的有肉」，特意把「肉」字放在前面。

看到這裏你是不是餓了？別着急，我還要告訴你，這家「饅須有」的老闆是我的老朋友，陝西大才子，他在香港工作多年，退休後還在香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。到這裏吃肉夾饅，吃的就是中華傳統文化。吃饅前，你一定要好好瀏覽樓上樓下的文化牆哦！



●「饅須有」店舖的文化牆成為打卡點。 作者供圖

# 岑公博聞強識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筆者與岑公是君子之交，君子之交淡如水也。早已忘記了何時何地初度見面，後來大多是應約到岑公主持的電台「個人意見節目」《講東講西》談天說地。甚少相約一起飲茶、食飯、睇戲。岑公可被歸類為「跨媒體文化人」，在報刊撰文、出版書籍、在電視台亮相、在電台開味等等。筆者亦有這些經歷，不過岑公是專責、主角、明星，筆者則是兼職、閒角、特約。過去廣大聽眾觀眾暱稱其為「飛哥」，近年則以其尊姓拆字，號為「山今老人」。筆者則以江湖上的輩分，稱一聲「岑公」。

當代教育家、語言學大師季羨林曾指出「二十一世紀年輕人要三貫通」，即中西貫通、古今貫通和文理貫通。岑公與筆者於三貫通都合格，我們那個時代的理科生都是清一色兼修物理、化學和生物各科。從理入文不難，由文轉理就極不容易了。岑公「開味」做節目從來都兩手空空，不帶任何資料或講話大綱。筆者雖然也算興趣廣泛，差不多所有話題都有應對辦法。大不了一便臨陣磨槍、現炒現賣而已。但是每次都預備一紙大綱，將打算要講的重點都列出來。結果總是預備的比真正有講出來的為多。如果岑公或其他嘉賓先講了，筆者就不重複；岑公亦常因應筆者講了些什麼而見機行事，另講別的作補充以免重複。可以說如我先講了東，他便講西；我先講了西，他便講東。岑公實在配得上博聞強識四字，在節目上高談闊論、引經據典、如數家珍。筆者則雜務多，再加小時候懶於背書，到老要用在清談節目時便要預先準備「提場」，以防記錯了。

筆者沒有亮眼醒目的銜頭，後來岑公在節目中介紹這晚來賓時，就送筆者一個「文史研究者」的稱呼，真是愧不敢當，又卻之不恭。我們都是在香港讀書長大的一群人，少不常用英語輔助思考。岑公說筆者「研究」什麼的，或指Study而言，這字既可解作學習，亦可解作研究。那麼說潘國森Study文史倒也不假。如此說也實在四平八穩，研習語言文學、研習歷史文化倒是沒有什麼門檻可言，人人都有發言權。

岑公曾對筆者言道，想找一回在《講東講西》談一談古印度的耆那教，當時筆者只好允諾奉陪。岑公既逝，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，此約也就無法實現了。《回顧與岑公交誼》(下·完)

# AI 認知與東西路徑

他鄉港聲 梁家僊

文匯報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最近和一眾科創界的朋友做了場關於AI產業革命的分享，現場討論最熱烈的兩個問題：一是「我完全不懂技術，到底怎麼入局AI？」二是「現在西方對AI監管越來越嚴，中國的AI產業還有優勢嗎？」作為在內地發展近20年的香港文創科創從業者，我見過太多技術浪潮來來去去，在我看來，搞懂這兩個問題，普通人就拿到了AI時代的入場券。

很多人說AI發展太快，跟不上就會被淘汰，其實大家談論的「AI」根本不是同一回事。現在大家對AI的應用認知分成了4層，不同層級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：第一層是「只聞其聲，未見其人」，也就是聽過AI但從來沒用過，這種情況在內地其實很少見，畢竟現在哪怕是長輩手裏也基本裝了豆包、千問這類免費工具，反而是不少香港的朋友還停留在這個階段，總覺得AI是遙不可及的高科技，不敢輕易嘗試。第二層是「免費嘗鮮，淺嘗輒止」，也就是用免費AI的群體，大部分人都處在這個層級，覺得AI有點用但經常「犯傻」，主要用來查信息、寫個初稿，把它當成「大號百度」來用，沒有真正把AI融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裏，相當於拿着智能手機只用來打電話，浪費了大部分功能。第三層是「付費升級，效率倍增」，也就是願意為AI付費的用戶，他們會用AI做編程、整理海量文件、分析行業數據，相當於給自己配了個24小時不

休息的助理，我身邊不少做新媒體、做外貿的朋友，靠付費AI工具把工作效率提升了三五倍，相當於一個人幹了原來一個團隊的活，成本降了，收入自然就漲了。第四層是「深度參與，規則制定」，也就是在大廠參與AI底層代碼開發，或是自己開發長尾小應用的從業者，他們不只是AI的使用者，更是規則的制定者，我們現在做的AI智能體、開源工具就屬於這個範疇，不僅自己用AI提效，還開發工具給更多人用，享受技術帶來的長期紅利。

其實不用害怕AI，也不用覺得它高不可攀的技術，你對AI的認知在哪一層，就會獲得哪一層的紅利。哪怕你只是從第二層升到第三層，把AI用在自己的本職工作裏，不用辭職創業，不用搞什麼高科技，就已經能超過身邊80%的人了。

聊到AI的發展路徑，我總會想起工業革命時期英國著名的「紅旗法」：1865年汽車剛發明的時候，英國政府擔心汽車會衝擊馬車行業、帶來安全隱患，規定汽車上路必須有一個人舉着紅旗在前面走，行駛速度不能超過每小時4英里，比馬車還慢，這條法律直到1896年才被廢除，直接導致英國的汽車工業被德國、美國後來居上，錯過了整個汽車時代的紅利。

現在的AI領域其實也面臨類似的選擇：安全當然是第一位的，但如果因為害怕風險就把所有創新的路都堵死，最後只會重蹈當年英國的覆轍。

現在西方對AI的監管越來越嚴，很多應用場景都被限制，反而給了中國AI產業彎道超車的機會。

錢學森先生當年提出過產業革命的六次劃分，我們現在正處在第四五六次產業革命疊加的階段，第四次產業革命以電的廣泛應用為標誌，而中國現在無論是電力供應還是算力基礎設施的優勢，都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。我們的特高壓技術全球領先，光伏、風電等新能源產業產能遍布全球，算力中心更是遍布全國，這些都是AI產業發展最核心的基礎。

中美在AI領域的競爭路徑其實完全不同：美國走的是「模型優先」的路線。集中資源做大模型、做底層技術；中國走的是「應用優先」的路線。我們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鏈，最多的應用場景、最大的用戶市場，完全可以走「硬件+應用」的路線，把Token和硬件產品結合起來，開源部分技術，靠硬件和服務盈利，就像當年我們的家電、手機產業一樣，靠性價比和場景優勢佔領全球市場。

很多人擔心我們在大模型技術上落後於美國，但在我看來，技術最後還是要落地到應用上，我們有最懂用戶的產品經理、最完整的供應鏈、最願意嘗試新事物的消費者，這些都是我們的核心優勢。不用盲目迷信國外的技術，把我們自己的場景做好，把應用落地做好，中國的AI產業一定能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

# 實體書十元義賣嘉年華

琴袖乾坤 余似心

做父母的大都希望子女多認字，以前有些塑膠童書讓幼兒洗澡時也可以學習。不少母親的袋裏都會有些童書，給年幼子女外出時爭取時間看書。一些外國風格的餐廳，會提供墊桌畫紙和顏色筆供小食客書畫。世易時移，現時在公共場所常見父母隨手遞個手機給幼兒，讓他們安靜地投入先進的電子世界。

電子領域資訊豐富，色彩艷麗的動態畫面極為吸睛，孩子很容易投入其中但難以抽離。常見被取走手機或電子機的孩子大吵大嚷，哭得翻天覆地。不得不承認電子世界提供了聲色具備的眾多常識，有助孩子學習，但父母得分外小心選擇，別讓孩子只縱情遊戲。另一方面，要留意學習方式不僅是眼看和耳聽，還有手寫和口讀。

據統計，香港學童的讀寫障礙率高達13%，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三個百分點，而且有日益增加的趨勢。為何香港兒童的讀寫障礙比率偏高？這提

醒家長關注孩子的學習方式和習慣。父母陪讀是很重要的，善用實體書能收更高成效，孩子不容易因電子設備同時存在的遊戲而分心。無聲的實體書有助孩子自行發聲閱讀，增強他們對文字的記憶和識辨能力，同時對書中內容產生想像力。他們手拿著一本書，更能感到自己和書本之間的直接聯繫。

太古地產每年一度「書出愛心 十元義賣」活動是個很好的機會讓一家大小、不同年齡的成員投入閱讀的世界。對孩子來說更是一個吸收知識、與書本同歡的嘉年華，他們可以聽故事、參與遊戲、選購喜歡的書。這是個慈善活動，書籍都是市民大眾捐出，一律以十元義賣，所籌得善款作慈善用途。孩子也得以從中學習分享和行善，今年看過的書本明年可以捐出，再購入別人的捐書，讓知識循環流轉、善心傳播，活動本身就充滿教育意義。活動在5月7日至10日及5月14日至17日於太古坊舉行，值得一家齊齊去買書。

# 醜景點與美育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每逢長假過後，小狸最愛看的就是社媒上的「兩眼一黑」系列——眾網友外遊歸來後忍不住第101次曬圖吐槽各景點和城市的醜建築、醜裝飾、醜亂入，「迷惑」「抽象」「煞風景」是高頻詞彙，每個帖子都在發出同一個靈魂拷問：明明大好河山，為什麼搞得這麼醜？

從武隆的飛天之吻，到科目三的滕王閣，再到調色盤裏的桂林溶洞，以及全國都在等你的藍牌子……這些「審美災難」，如果是一個，那可能是設計者的失誤，但如果是一堆，那就不得不思考長期以來社會美育缺位的問題。

長期以來，我們都習慣把「美觀」放在所有訴求的最後，學校的美育教育也自然處於邊緣化的地位。在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期，基礎教育展現出強烈的工具主義色彩。在「唯分數論」的評價體系下，教育資源高度向語文、數學、外語等主課傾斜。同時，由於數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納入中考或高考總分，導致家長、學生甚至學校在時間分配上往往採取「功利性」策略，甚至將美育視為一種負擔或點綴。

但審美能力，從來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「高級點綴」，而是一個人的核心素養。同時審美雖有天賦，但更需要長時間不斷地培養和浸染。

長期生活在缺乏美感的環境中，後果是可怕的。因為人的感知會變得遲鈍。當我們習慣了粗糙，便會對精緻失去敏銳；當我們適應了混亂，便會對和諧失去追求。醜慣了，便看不懂美了。

面對滿目瘡痍的「審美荒原」，重提美育顯得尤為迫切。然而，美育絕非簡

單的「藝術興趣班」，也不是教人如何畫一張畫、彈一首曲子，它本質上是一種關於「如何感知世界」的教育。

美育的第一層意義在於「辨別」。蔡元培先生曾提出「以美育代宗教」，其核心在於透過對美的追求，陶冶情操，剔除鄙吝。一個受過良好美育的人，能夠在喧囂的視覺垃圾中辨認出真正的經典，能夠在廉價的感官刺激面前保持克制。美育給了我們一雙眼睛，讓我們能看見那些隱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比例、節律與靈魂。

美育的第二層意義在於「尊重」。美感往往源於對規律的尊重——尊重自然的底色，尊重歷史的紋理。好的建築應該像從泥土裏生長出來的，好的景點應該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次回響。缺乏美育的人往往傾向於「改造」與「破壞」，而具備審美素養的人則懂得「順應」與「保護」。

一個社會的進步，不僅要體現在GDP的增長上，還要體現在公共產品的精緻與人文底蘊的深厚上，而審美正是軟實力的核心。醜建築帶來了流量卻帶走了聲譽，損害的是城市形象。同時，審美還關乎幸福感：街道上的花藝、公園裏的長椅設計、公共空間的光影處理，以及古蹟的厚重質感，這些細節直接影響着市民和遊客的心理狀態。美具有療愈作用，而醜則會帶來無意義的焦慮與壓抑。

美，是人類通往高尚靈魂的必經之路。當我們不再為那些沙灘地標鬧心，當我們開始要求身邊的每一盞路燈、每一處小景都具備基本的美學自覺時，那個真正文明、優雅且溫潤的社會，才算真正到來。而審美能力，是我們在平庸生活中保持尊嚴的最後一道防線。

# 靜音車廂

信而有征 劉征

不知道從何時開始，12306平台多了一個「靜音車廂」的選項。當然，進了靜音車廂，也不能保證每個乘客都不講話。但是，每當有人試圖高聲講話的時候，那位可愛的乘務員就會走過去，很溫柔地俯身對他說：「乘客，這是一節靜音車廂，如果你要接聽或撥打工作電話，煩請你前往車廂銜接處。」然後，這位乘客就會意識到需要保持安靜，至少也會壓低聲音。這讓我想起某些容易引起衝突的「文明——不文明」對立事件，恰恰在於雙方都把制止當成某種挑釁行為。於是，尊嚴之爭而非就事論事就成為這類爭吵的一個起因。

這讓我想起今年過年的張家界旅行。一輛接駁車，上來一家五口，外婆、父母，還有兩個孩子。孩子一直天真爛漫地打鬧，差不多的時候，有位年輕人便高聲制止了這種吵鬧，為此，雙方還發生了口角。從合理性的角度，制止者的行為並沒有問題。倘若在互聯網上，這位年輕人還會被奉為楷模，因為他維護了文明的秩

序。然而，到了現實世界，你會發現，大多數人反而更傾向於息事寧人，以至於整個車廂的氛圍有些微妙地向那一家五口傾斜了。或許是察覺到了車廂氛圍的變化，到了下一趟接駁車，這位年輕人便主動把自己的座位讓給一位站着的小姑娘。這種看起來矛盾的行為一旦發自於同一個人，就顯得十分複雜。

在靜音車廂，這類複雜的情形不必出現。一名乘客不必忍受另一名乘客的騷擾，因為乘務員會出面阻止這一切。而乘務員並不疾言厲色，她不會因為自己站在正義的立場，就顯得高高在上，更不會因為出言制止這一行為有些專斷就會感到心虛。作為一個訓練有素的職場人，她的行為是恰如其分的，而她也天然被賦予了某種維護秩序的權力。相對於乘務員，個人制止者的行為就複雜得多。他的第一重困境來源於他的自我詰問。他之所以反對噪音，是因為制止者認為這一行為干擾了他人，但一旦自己發出了制止，他就在打破自己的原則，這讓他天然有些不適感。因而，他的制止就有些不大自然，看上去過

於激動，儘管他實在是正義的。乘務員不存在這一系列的心理活動。作為專業人士，她用一種經過訓練的勸阻口氣去勸誡那人，並使他安靜下來。

況且，一旦你將安靜當成一個標準，你就會發現，歷來候車廳裏此起彼伏的班次提示音，以及上到車上的各種高音喇叭，從問候、提醒到廣告，都有些聒噪。絕大多數乘客不會誤掉自己的列車，如果他誤車了，也很少會因為高音喇叭的播報而趕上。因為無差別、不間斷提醒，會使乘客將所有聲音屏蔽掉。就像現在的那些電話廣告，倘若多到沒有邊界，不接聽任何電話似乎已經成為常態。就譬如我，電話是常年靜音的。倘若不得不給別人的電話，我會標注我從不接電話，如果聯繫我，請根據我的電話號碼添加微信。因為人接收信息的能力有限，在一個渠道出現過多干擾，這個渠道就會失靈。而我們看到的靜音車廂，發揮着一種理想的規勸作用。它先是允許你選擇喧囂還是寧靜。到了靜音車廂，它也不是強制的，而是用訓練有素的倡導來與你溝通，這讓整個高鐵顯得相當文明。